

约翰·奥尼尔及其“野性社会学”

文/孙飞宇

在关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权威叙事例如《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中，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作为两个传统的交集而颇为引人注目。一方面，他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传统之中在舒茨（Alfred Schütz）与古尔维奇（A. Gurwitsch）之后的新代表；另外一方面，他又因为《身体五态》以及《沟通性身体》等代表作品，而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不过，这两种对于奥尼尔之研究的“权威界定”可能都忽略了其学术工作的真正起点与内在理路。

就其工作而言，奥尼尔的翻译、编辑和写作等工作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蒙田的散文写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他对于时代核心问题的把握与传统的继承发扬，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北美社会科学整体转向的敏锐感知与回应。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老人”，奥尼尔亲身经历了以《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季刊》等代表性学术期刊在写作体例与研究风格方面的巨大转变，意识到了这一转变所代表的巨大的现代性潮流，并借助于既有的经典理论资源及其发展来应对这一转变，提出了野性社会学的鲜明主张。他坚持将自己的理论工作放置于更为广泛的西方思想史传统之中，坚持运用一种散文体的写作风格，明确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要关心人类与社会疾苦，直面生活，反对方法论至上主义，同时将学术写作视为一种在人类文明历史中自有其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

第一，奥尼尔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文体。这种研究性文体，可以被看作某种呈现与提交、某种开始、某种照面。在提交的同时，需要关注提交的基础。提交并不意味着对于作为其基础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断裂，尽管这同时必然意味着某种乡愁（nostalgia）与理念的开始。然而，野性社会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会环顾四周，发现那些不言而喻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之现象。这是一种同时将自身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诗意的栖居——尽管这一栖居绝非意味着对于那些爱欲、忧愁以及苦难的无视，而是恰恰相反，置于世界之中，就意味着要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本身，关注行动者的生死爱欲，恩义情

仇，及其“建筑世界”（world-building）的过程。野性的社会学绝不愿意牺牲自己，而换回某种“合理的”、去身体化与去世界化的思考方式，因为后者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在现代性制度中的发展前景，然而却往往对于最值得被注视之事件，熟视无睹。在这个意义上，奥尼尔所主张的野性社会学毋宁说就是社会学的应有之义。

第二，奥尼尔将野性社会学视为一种日常的自我培育而非仅仅是一门职业。日益科学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要求其研究与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严格区分。然而奥尼尔的主张恰好相反，要求作者本人与其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所以野性社会学既是一门关于自身的科学，同时又是一种自我培育的路径。这一研究既关于其对象，也关于研究者自身，关乎他们共同的自由与解放。这是奥尼尔关于现象学社会学之方法的诗意宣称。然而这是一种带有危险的宣称，因为方法打开/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激发/形塑着我们的感知与激情，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是何种的世界。所以身处于现象学传统之中的奥尼尔，力图将现象学社会学的眼光与视域拓展至政治、道德与社会等传统大陆理论的领域。

第三，由此出发，野性社会学要求研究普通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贴身（skin）”之处。这一宣称在思想史传统之中有其根源。虽然奥尼尔明显受到来自于梅洛·庞蒂与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不过阿尔弗雷德·舒茨以及加芬克尔对于日常生活的勘察，首先为奥尼尔的野性社会学提供了入手之处。奥尼尔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理解日常生活，进而重构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知。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的能力，在社会机制乃至国家政策对于生命、性以及家庭的设计造成重大影响的当今时代里，试图恢复人性的形态。

第四，野性社会学需要一种“身体性写作”的实践。这是奥尼尔在其工作的晚近时期的入手点与写作视域。对于自身已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意义世界的日常生活来说，社会学研究与这一世界的遭遇天然面临着阐述的问题。奥尼尔将世界看作是身体性的世界。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无处不在（omnipresence），无法简单地被科学化的目光在拉

开一定距离的前提下注视。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叙述，那么真正的叙述就不应该是空洞地去复述，而是灵魂的交谈，是倾注于我们的栖居之处，并且以此方式来栖居。作为贴身行当的野性社会学，本身的研究与写作恰好就是现代性紧张的体现。奥尼尔主张社会学需要除魅，需要以一种朴素直白的目光，在看待世界的同时，体会自己也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需要以一种“照面”而非客体化的方式来写作。而写作就是与读者的直接交流。这是现象学传统之中的描述性“风格”。奥尼尔在其现象学的视域之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权力、交换、经济以及爱欲，是整个世界的绽放与遮蔽，压抑与反抗。这是对于生活世界概念的重大发展。

在奥尼尔对于作为贴身行当的野性社会学的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是《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以及《沟通性身体：沟通性哲学、政治与社会学研究》。在这两部作品中，奥尼尔提出要以“活生生的身体”为线索来理解生活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以“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实践”为起点，讨论了人类是如何通过身体来思考自然、社会与世界，以及其中的种种制度、历史、家庭甚至是道德、政治与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如果想要彻底理解世界，那么这一对于身体的理解就要成为其根基，因为这种彻底的拟人论是日常生活之中常识的历史性基础，而这样一种常识态度对于任何更高层面的人类统一体而言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成就”。

第三，野性社会学对于社会学传统本身也提出了挑战。他并不否认经典三大家的殿堂地位，然而却在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愿意从更广泛的思想史传统之中汲取自己的思考灵感与资源。从这一对于学术的理解和主张出发，在奥尼尔看来，在社会学的经典时代里，对于生活的研究和理解最具有启发性质的工作，乃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奥尼尔经由梅洛·庞蒂而重返弗洛伊德的经典文本，尤其是他那五个重大的案例史。这一工作的成果，同时也是野性社会学的重大成就，就是他在2011年的新著《灵魂的家庭经济学》（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他通过对于经典文本的精读，首先将文本置于文本之中，也就是置于历史、文化、社会与个人的生死爱欲之中去加以理解，同时将这一文本视为是一种作者与作者之间进行表达与理解的身体艺术；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将弗洛伊德所讨论的主题与问题，以及弗洛伊德的治疗与写作工作本身，放置于欧洲思想史传统之中来加以研究。最终，身体理论还要在其开掘者那里，在去蔽式写作的同时被实践着，或者说，在实践的同时被“理论着”。

在其解读之中，奥尼尔力图构建起一套理解现代主体性的方法论框架。在这一关乎最为隐蔽的琐屑平常之事的叙事行为里，奥尼尔开始融合尼采式哲学、精神分析、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主义人类学乃至神话学等，并将人类社会理论传统之中的重大议题，如家庭、交换、契约、劳动等，都纳入了对于这一经典工作的考察之中，同时既从思想史的传统来加以研究，又将弗洛伊德及其患者放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历史中来进行研究。

奥尼尔这一作品的重要特点，就是同时既精读文本，将讨论的基础严格限定在文本中，又能够放开视域，以丰富浩瀚的知识与磅礴的气势打开在每一个案例的那些小小故事之中所潜藏的丰富的文化、历史与社会性视域与意象，同时将其与社会与政治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奥尼尔这一研究主题的初衷，就是要通过研究“人成为人”的历史，来解释日常生活之中作为“在世之在”的那些宏大视域，以便获得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深度知识。

在这本书中，奥尼尔显露出某种同时既生成结构又去结构的视域观与成熟的表述方法。在这样一种观看之中，奥尼尔所看到的精神分析，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去/结构。在写作中，奥尼尔发现了精神分析与西方文明史中某种双重诞生之间的亲和力：我们每一个人在母体（mother-body）之中的起源，以及“给予生命的欲望之起源”，这一欲望既有其生物性与身体性，又有其社会与文化性，简言之，既有母亲一般的性质（如同母亲生育每一个“我们”），又有父亲一般的特质（如同父亲生育法律、艺术与科学这三位一体的自体/单性繁殖领域）。这两种都堪称单性繁殖（parthenogenesis）的幻想——奥尼尔相信这一单性繁殖的幻想居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核心，同时也是理解栖居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西方文明的核心线索之一。

在这一关于忏悔者与生活世界的去/结构之中，分析师弗洛伊德首先成为了一位听众，然而这位听众，作为尼采意义上的歌队成员，在聆听的时候，也在阐释。所有的案例史，在这一过程之中，都在成为一种体现出人类文明实质问题的深度理解社会学的同时，还兼具了对于现代社会学的深度反思。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何为？在这个意义上，野性社会学不仅要求直面生活中的爱恨与苦难，还要求对于学科本身的属性，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大视野中加以理解。这是奥尼尔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文体的深层意义所在。^⑤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